

美日安全关系的扩大与美国的亚太战略动机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所 李 力

[提要] 本文分析了美日安全关系扩大的背景和美国的战略动机,同时指出了美日安全结构存在的问题。

美国总统克林顿 1996 年 4 月访问日本以及两国随之发表的《日美安全保障联合宣言》,标志着冷战后美日安全同盟关系的实质性扩大,这一事态的发展有其深刻的国际背景。

一、美日安全关系扩大的背景

首先是日本的国内背景。随着日本逐步进入后工业化时代,其经济实力、政治生活及社会结构与冷战时期相比已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日本向政治大国前进的趋势已确定无疑。过去 10 年内日本在东亚的投资增加了 2 倍,达到了 1000 亿美元,该地区的安全与日本有直接的关系。日本新一代力求得到与世界第二大经济地位相称的政治地位,日本的主要舆论之一《读卖新闻》、企业联合会和政界领导人已经要求对宪法重新解释。反对党领袖小泽一郎甚至要求修改宪法,以适应集体安全。更值得注意的是,桥本内阁保证在防务方面发挥更加积极的作用,所有这些事态都表明日本对军事的忌讳已经淡薄。日本对中国的战略防范意图也日益明显,最新的日本防卫大纲就明确提出了日本周边地区“核力量的继续发展”。1996 年 4 月 18 日日本《朝日新闻》更直接地写道:“日本政府认为,在牵制将成为 21 世纪经济大国的中国方面,美国的存在必不可少。”日本国内的政治气候正朝着趋向日本发挥更活跃的军事作用的方向转变。

在美国方面,冷战结束后,美国把防止一个威胁美国利益的超级大国的重新出现作为其全球安全战略的第一目标。美国政、军和情报部门的多数人认为,在未来的亚太地区中国最有可能成为这样一个超级大国。1996 年 3 月第三次台海危机后,美国国会和舆论界要求对中国进行战略防范和堵截的呼声达到了冷战结束以来的顶峰。海湾战争结束后不久,美国国务卿贝克提

出了一个亚太安全“扇型结构”的构想,即以美日、美韩、美澳、美菲等双边防御条约为骨架,构成一个亚太安全的“扇型结构”,起到一种纲举目张的效果,而美日安全关系正是其中最重要的骨干。同样在这一时期,由于内部呈现严重的社会和经济困难,美国内出现了新孤立主义与国际主义之争,社会各界对海外驻军提出了一些质疑,要求优先处理国内事务的呼声日益高涨。在此背景下,美国从其海外最大的军事基地菲律宾的苏比克海军基地全部撤出。但美国的战略决策机构,尤其是军方,始终希望在本地区寻求新的战略立足点,美国并未放弃其亚太“扇型结构”安全战略。“美济礁”事件后美菲军事关系的重新接近以及美总统克林顿 1996 年 4 月与日本和韩国首脑的安全问题会晤充分证明,美国需要强化这一“扇型结构”。

东盟各国对中国综合国力上升的惧怕心理也在增长,特别对中国海空军力量的增长有戒备心理。新加坡前总理李光耀最近在接受美国《商业周刊》记者采访时的一番话颇能概括东盟各国领导人考虑亚太安全的心态——我们不得不接受这一现实:不管东盟各国力量如何联合,都无法顶住与中国的军事对抗。除非有美国这样的外部力量介入,否则该地区是无法实现力量平衡的。

二、美国的战略动机

1995 年美国在全世界的商品贸易额约为 1.32 万亿美元,其中大约 1/3 是同太平洋沿岸各国进行的。美国不同太平洋地区进行贸易就不可能继续成为经济大国,保护其在亚太地区的经济和安全利益是美国必须确保实现的战略目标。为实现这一目标,美国一方面要极力保持其在本地区的军事存在,必要时甚至不惜一战。美国防部长佩里 1996 年 4 月 18 日对新闻界表示:我们

派遣航空母舰不只是想对中国发出信息。我们是想让这一地区的所有国家都明白,美国把西太平洋的安全保障与稳定看作生死攸关的国家利益,而且美国拥有保护这种利益的军事力量,如有必要,美国将动用军事力量。另一方面,为减轻其财政负担和获得更大的国际支持,美国又试图拉更多的亚太国家进入以美国为主导的安全结构,特别想把日本拉下水。

美国舆论界对这一战略动机做了详尽的描述:冷战的结束使美日关系的重点从安全转向经济,这是可以理解的。在贸易至关重要的世界上,这是必要和健康的。但克林顿政府却在贸易问题上走得太远了。美日在汽车问题上发生了激烈的争吵,在那段时间美国政府似乎忘记了日本是盟国。……日本是保留美国安全力量的关键,如果日本拒绝美国在这个地区提出给予支持的要求,那将是一场灾难。美国的另一个安全利益是在中国。谁也不想使中国变成苏联式的敌人。直到中国在国际上采取更负责任的行动之前,美国和日本在制定对华政策方面是有共同利益的。^①

1996年4月29日的《芝加哥论坛报》则表达得更加露骨:条约使日本第一次同意在和平时期向美国部队转运军用品,并且仔细考虑是否有可能在危机期间与美国进行军事合作。它向亚洲国家尤其是中国发出了一个明确的信号,即日本最终准备考虑加入美国在太平洋地区的军事行动。美国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就表现具有某种军事天分。美国希望降服这个天才,使它站在美国一边。……虽然美国在军事上能够独自对抗任何亚洲入侵者,但在心理上却不能。如果日本在某场危机袖手旁观,比如台湾危机,那么很难知道未来的总统怎么能够在国内赢得解决这场危机所必需的支持。……克林顿政府3年来把日本当作经济掠夺者和实际上的敌人之后,终于能够正确看待日本了。日本是朋友。如果该地区有潜在敌人的话,那就是中国。

尽管美认为中国将来可能成为威胁美国利益的超级大国,但绝大部分上层美国人士又不能确定中国在邓之后将朝哪个方向发展。于是包括总统克林顿在内的主流意见认为,在目前情势下最明智的做法是向积极方向努力,用“全面接触”的战略,通过与中国正面交往使其成为一个“负责任和守信用”的大国,最终将其纳入国

际社会。应尽可能少使用对抗、遏制等激烈手段以避免把中国推向反面,尤其要避免由于政策不当而将中国变成美国的敌人。美国防部长佩里在最近的一个国防政策报告中认为,美国在两次世界大战中付出了巨大代价,为防止再发生世界大战而对苏联进行的全面遏制所付出的代价也是美国难以接受的,因此,今后美国的全球安全战略应把重点放在预防。相比之下预防的代价较小,也不具遏制那样的攻击性,能避免刺激对手过度反应。

美日两国在新发表的《美日安全保障联合宣言》中不提及中国的不稳定。“美济礁”事件后,尽管菲律宾方面一再敦促和请求,美国仍然不对菲律宾承诺保卫卡拉延群岛(南沙群岛)。这些做法都是出于避免刺激中国的考虑。但是美国近几年也不再公开表示在南沙问题上保持中立,美军方甚至曾扬言在必要时向该区域派军舰护航,美国采用的是“有意图模糊”的战术,与在台湾问题上的伎俩如出一辙,试图以“模糊”战术达到其预防中国“在亚太扩张”这一清晰的战略目的。

另外,美国使用“模糊”战术也有其国内政治的考虑。1993年美国派兵索马里从事人道主义援助遭重挫,此后美国会和舆论界对向海外派兵变得极其敏感,除非总统能向国会证明确实有关美国重大的国家利益受到威胁,以及可能遭到的人员伤亡程度小到公众可以承受,否则任何海外军事行动若遭到哪怕是极小的挫折,都将很可能给总统的政治生命带来重创。美国尤其不愿意看到美国人为外国的利益而流血的情况发生。基于这一政治考虑,美国在台湾海峡和南沙问题上意图避免出现事先对外作出承诺、而事后由于国内政治压力而不能兑现承诺并因此损害美国大国威望的尴尬局面。

三、尚待解决的问题

克林顿的访日并未从实质上改变由美国领导的亚太安全结构,仅仅在本地区维持军事存在是不够的,这一结构的基石并不像美日首脑所想象的那样坚固。美日安全结构至少面临着三个问题。一,美国在亚洲的持久力令人怀疑。自从越南战争后期以来,美国在本地区军队的数量在持续下降,美国在亚太驻军数量从越战高峰时期的50万下降到90年代初的13.5万,从菲律宾撤出后又削减到目前的10万。而且美国目前还在给继

^① 美国《商业日报》,1996年4月17日。

美拉关系发展轨迹初探

中国社会科学院
拉丁美洲研究所 张文峰

【提要】 美国与拉美国家之间的关系是国际关系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通过对美拉关系历史发展过程的考察,可以发现在美拉关系发展过程中存在着一定的发展轨迹,这就是:合作——冲突——再合作——再冲突,循环往复,波浪式前进,螺旋式上升,每一次新的合作都比上一次提高一步,其最终目标将是真正平等互利的合作。然而,这种最终目标必须经过长期斗争才能达到。为此,发展中国家必须联合起来,团结奋斗,为争取早日实现真正平等互利的国际关系而斗争。

迄今为止,美国和拉美国家之间的关系已有170多年的历史。在这期间,拉丁美洲国家同美国之间既有合作也有冲突,既有协调一致也有矛盾斗争。那么,在美拉关系的发展过程中,有没有什么轨迹可寻呢?我认为回答应该是肯定的。对美拉关系的发展轨迹进行探讨,

不仅有助于对美拉关系的深入研究,预测美拉关系的发展趋势,而且可以为进一步探讨南北关系作些贡献,同时,还可为我国制定对外政策提供参考和借鉴。

续削减找台阶。尽管美日联合宣言中坚持美国将保持10万驻军,但是在“目前的安全环境下”而不是从前的“在可预见的将来”。美国防部长佩里已表示,如果朝鲜半岛实现统一,由于亚太地区安全保障形式会发生变化,美国就会有可能会重新考虑美军兵力的部署水平和方式。二,美日同盟关系的韧性并不乐观。两国的贸易争端如果再次爆发将给这种关系带来严重考验。美日发表共同宣言的同时,美国总统安全顾问莱克就日美关系发表评论时表示:“我们的政策是让安全保障关系和经济关系保持平衡,这并不意味着安全保障的优先程度提高,而贸易和经济的优先程度下降。”这至少暗示着,美国不会因为日美安全同盟的关系而放弃与日本的贸易竞争。三,未来美国在日本保持大型军事基地或利用基地进行军事行动仍需克服日本国内的政治障碍。近几个月来美国高级领导人不断声称“朝鲜的垮台仅仅是一个时间问题”。^① 如果朝鲜问题戏剧性地结束,美国将不再有理由保持目前规模的军事存在。朝鲜问题解决后,美国在亚太的驻军大约将保持在5至7万,主要是海军和空军,这需要在日本保持大型海空军基地各一

个,从日本国内目前情况来看相当困难。战后40年的和平主义和对军方不信任的政治文化在日本有深刻的影响。日本首相桥本最近在联合执政党党首会谈时强调,日美安全条约的远东范围并未改变,关于发生不测事态时的日美合作,要始终在宪法的范围内充分研究。

美国每年为维持在海外的驻军和基地要耗费将近2000亿美元。由于近10年来美国的年度防务开支下降了40%,目前的国防预算已不足以维持美军同时赢得两场地区冲突的需要。事态的发展充分说明,美国正在亚洲寻找多个“安全费用分担者”。日本和韩国已经在为美国分担防务费用。美国的下一个目标极可能是东盟,佩里已多次表示过,美国有意让东盟地区论坛涉及地区防务问题。显然,在亚太安全问题上,冷战后的美国领导人有意继承70年代初“亚洲人打亚洲人”的“尼克松主义”,这样既方便美国军火商发财,又可避免美国兵流血,但亚太地区错综复杂的局面仍有可能最终迫使美国不得不走上前台。

[责任编辑 邵峰]

^① 《远东经济评论》1996年4月26日。